

錦上添花話洋彩

兼談琺瑯彩、粉彩

在乾隆朝《活計檔》中，記錄有名為「洋彩」的瓷器，裝飾極其精細華麗，奇巧者甚至被譽之為「鬼斧神工」；

釉色粉豔光鮮，後人常稱之為「粉彩」，然又與「琺瑯彩」隱然有別。本文以清宮留傳下來的實物與檔案記載比對，試圖解釋這二者的同異。

緣起

對一般陶瓷愛好者而言，「洋彩」似一陌生又遙遠的名詞，不若「粉彩」耳熟能詳。本文所談「洋彩」就是清宮檔案的「磁胎洋彩」，乾隆時期多冠以「磁胎」、「磁胎洋彩」或就是後人所稱之「粉彩」，但因長久以來「洋彩」一直被認為就是「粉彩」，故而「洋彩」之名，早被「粉彩」所掩。有些陶瓷研究者認為粉彩就是洋彩，然而，洋彩卻不同於粉彩，尤其是乾隆朝唐英所創製的磁胎洋彩器。今為釐清並還原一批原藏紫禁城乾清宮，後為國

廖寶秀

立故宮博物院重要收藏——磁胎洋彩的本來面目，為使其與磁胎畫琺瑯器，更易於區別劃分，本品名皆依乾隆時期清宮檔案所列名稱。復原當時品名，或將更利於探究這批磁器的製作年代及特徵。

「粉彩」之名未曾出現於清宮文獻記載，而是出於清末民初的幾部陶瓷專書，如陳瀏《匋雅》（宣統二年，一九一〇）、許之衡《飲流齋說瓷》（據《匋雅》作者稱此書部分抄襲其著）或瓷器商人口傳。當時，粉彩又被稱為「軟彩」，磁胎畫琺瑯又名「古月



圖一 乾隆六年 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茶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（列五七五 / 故瓷17566）



圖二 乾隆七年
左：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茶鍾（列三三七／故瓷8583）現品名：清乾隆窰琺瑯彩洋紅地花卉三多小盃
右：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茶壺（呂補二之2／故瓷17183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此壺由清宮檔案查核比對，應為洋彩，不為琺瑯彩。

軒」，康熙五彩則被稱為「硬彩」此一清代官窰新名詞的興起，在當時亦眾說紛紜。之後，民國三、四十年代，雖然有些學者提出客觀論說，^{〔註二〕}亦無濟於事，致琺瑯彩與洋彩兩者之間迄今仍然混淆不清。筆者認為最大原因，乃在於無法將實物與檔案史料有效結合，互為印證。這也是朱家潛先生在〈清代畫琺瑯器製造考〉一文中對前述幾位研究瓷器前輩的中肯評論：「《匋雅》及《飲流齋說瓷》對清代琺瑯彩的說詞，有些揣測之詞在內，後出的專著《古月軒瓷考》對前人雖有所辨正，但著者自有其不同角度的揣測之詞，這是因為過去未發現可靠史料的緣故。」^{〔註三〕}事實上，清宮檔案《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琺瑯、玻璃、宜興、磁胎陳設檔案》（以下簡稱《琺瑯陳設檔》）及《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（以下簡稱《活計檔》）上有關清宮琺瑯彩製作，經朱先生於一九八二年首次發表後，一般對清宮磁胎畫琺瑯

的製作，有了概括性的了解。然而，因史料未能與實物結合，研究者終究無所適從，亦無法確切認清此批清宮琺瑯彩與洋彩的各自面貌。關鍵性的洋彩作品，實物發表極少；即便少數雖經展覽或發表，也捨棄清宮舊名，更動名稱。^{〔註四〕}因此，在無正確品名與實物參考下，「洋彩」與「粉彩」問題依然存在，這也是筆者多年來一直以來想尋求的答案。四年前筆者經辦「也可以清心——茶器·茶事·茶畫」展覽，首次依據原清宮定名訂定品名，展出十數件康、雍、乾磁胎畫琺瑯與磁胎洋彩茶器，並且首度將乾隆朝「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紅地茶碗」及「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紅地茶鍾」（圖一、二左）介紹觀眾。在策展研究過程中，筆者發現同一技法的茶壺（圖二右）卻名為「琺瑯彩」。到底那些類型才是清宮所謂的「洋彩」？而「磁胎洋彩」與「磁胎畫琺瑯」的區分又如何？筆者因而決意將院藏原乾清宮端凝殿、養心殿等處所藏六百餘件

的康雍乾磁胎畫琺瑯及磁胎洋彩作一整理。經恢復原清宮檔案名稱後，^{〔註四〕}除康熙朝無製作文獻可查外，其餘雍正、乾隆二朝，百分之八十左右皆可由《活計檔》內比對得出，並獲知其製作年代，以及名稱不統一的可能原因。同時，「洋彩」與「畫琺瑯」經分類比對，彼此之異同亦有了更為清楚的概念及面貌。

磁胎洋彩

磁胎洋彩器與磁胎畫琺瑯器一樣，絕大多數陳設於乾清宮、養心殿；其他宮殿除圓明園外，極少陳設。以當時製作這麼稀少的珍貴之器，在清宮亦不多見，遑論宮外。一般人多無緣見到，即便見到，也是少數賞賜在外的幾件而已，因此訛傳附會，在所難免。在民國十四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故宮文物時，有些委員如余戟門先生在參與點查乾清宮端凝殿庫房藏品時，已發現這些附會之謬誤。因此，他在《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》（康雍乾三代

之琺瑯彩及琺瑯彩器之胎質）增補部分中即提到：「琺瑯彩以琺瑯繪畫之彩也，俗稱古月軒彩，此書稱蓄徽彩也。余昔長大理被派點查清宮寶物，於端凝殿東側一小庫中發現俗所謂古月軒彩器甚夥，盤、盃最多，瓶壺次之，皆盛以紅木匣（應為楠木匣），匣面均刻某種胎畫琺瑯字樣，始恍然悟古月軒彩者應名琺瑯彩，因其彩畫中皆有琺瑯，或全為琺瑯所畫之。故琺瑯之色有二，曰胭脂水，曰寶石藍，琺瑯釉俗稱為堆料或料釉，其實非料乃琺瑯也，且其胎質不以瓷為限，金、銅、料、玻璃皆有之，不過瓷胎為尤優美而已，琺瑯彩器始於康熙之末，終於乾隆，嘉道則無此彩矣。」余先生又說：「一點查之役，益得盡窺珍秘，惟恨當時牽於公務，不能時往，而所見所聞又未能隨時札記，至今引為憾事。」因此，他並未將端凝殿所藏二百餘件乾隆磁胎洋彩器，徵引入書，而且仍將洋彩視同粉彩。同書〈硬彩與洋彩之別〉亦

載：「硬彩對粉彩而言，粉彩者為彩釉中參以粉，其色柔軟，故又名軟彩，其不參粉者遂稱硬彩。康熙以前鮮有粉彩，雍正始盛，至乾隆而極。」亦相延前述瓷書，未將洋彩器作更詳細的解說。

清宮檔案記載，乾隆磁胎洋彩亦多收藏於乾清宮端凝殿，並經著錄於《琺瑯陳設檔案》等各種胎地陳設檔案內，惟封面並無記載「洋彩」辭彙（圖三），且大部分經配匣、訂名、刻字收藏。筆者曾親自查閱上述數冊《琺瑯陳設檔》檔案，統計磁胎洋彩器約有四十二項，一百六十九件，與現存故宮的一百九十餘件乾隆磁胎洋彩略有差異。絕大部分的磁胎洋彩從製胎至完成皆由景德鎮御窯廠承作。景德鎮御窯因不屬宮廷禁苑，其技法、製作過程資料可能外傳，因此陶瓷研究者對洋彩著墨較多。

「洋彩」正式名稱最早出現於雍正十三年唐英（一六八二—一七五六）所撰之《陶務敘略碑



圖三 (右)《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 瑤瑯、玻璃、宜興、磁胎陳設檔案》封面。
 (左)乾隆七年十一月《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乾清宮 上所登錄洋彩器皿現均藏於本院。
 (附加之「列」字原始編號，為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編，「列」字編號為作者查核後所加注。)

記》(一七三五)。另外，乾隆八年(一七四三)唐英奉命編撰《陶冶圖冊》二十編 其中第十七

編專述「圓琢洋采」亦列文釋之。(陶務敘略碑記)有如總理御窯務的報告，且被鐫石刻碑於景德鎮珠山之陽。此碑記內舉歲例貢御者五十七種，其中一種為「洋彩器皿，本朝新仿西洋法瑤瑯畫法，人物、山水、花卉、翎毛無不精細入神。」(圓琢洋采)則說：「圓琢白器，五采繪畫，摹仿西洋，故曰洋采。須素習繪事高手，將各種顏料研細調和，以白瓷片畫染燒試，必熟諳顏料火候之性，始可由粗及細，熟中生巧，總以眼明心細，手準為佳。所用顏料與法瑤瑯色同，其調色之法有三，。」這裏唐英已明白指出洋彩與瑤瑯彩皆屬瑤瑯色料，只是繪畫技法不同而已。清宮磁胎畫瑤瑯器大多以傳統中國畫法為主，但仍有極少數西洋圖案紋飾者。由此可見，洋彩用料雖與磁胎瑤瑯彩相同，但因起用了西洋新裝飾技法，繪畫技法不同於傳統畫法，故名「洋彩」。所謂洋彩就是使用瑤瑯顏料，以西洋繪畫方式描繪的瓷器，而唐英

正是創作磁胎洋彩的關鍵人物。磁胎洋彩與磁胎瑤瑯彩之間除了用料相同之外，技法、裝飾迥然不同，由於造辦處將洋彩、畫瑤瑯，以及其他胎地的畫瑤瑯，皆予配匣、配座，最後錄藏於(乾清宮瑤瑯器皿)項下，因此我們可以推斷，洋彩與畫瑤瑯在乾隆時期皆屬瑤瑯彩類，且備受重視。如據前述唐英著述，乾隆皇帝即位後，洋彩品類正值創始，此項技法或始於雍正晚期，傳世器中，亦有類似磁胎洋彩器的製作。(圖四、五)惟作品極少。雍正朝《活計檔》亦不見記載「洋彩」製作。清宮《瑤瑯陳設檔》檔案亦未曾登錄雍正朝「磁胎洋彩」項目，因此雖然雍正十三年唐英《陶務敘略碑記》已載「洋彩器皿，本朝新仿西洋法瑤瑯畫法」，然而實物訂名，亦有可能是乾隆二年以後之事。

清宮「磁胎洋彩」製作資料，初見於《活計檔》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(江西燒瓷器處)交來十數款瓷樣中的一項：「洋



圖五 雍正 磁胎洋彩綠地描金花卉六角瓶 上海博物館藏
此瓶或為雍正十三年唐英為雍正朝所開創的磁胎洋彩器



圖四 雍正 磁胎洋彩鏤空團壽蓋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此或為唐英為雍正朝所開創的磁胎洋彩器



彩黃地洋花宮碗一件。傳旨：以後燒造瓶、罐、碗、盤、鍾、碟等物，俱照此霽紅靶碗釉水勉力燒造。洋彩黃地洋花宮碗甚好，再燒造些，青花白地龍鳳小盒照樣燒造些；再照洋彩黃地洋花宮碗上花樣，將小盒亦燒造些。再唐英所進瓷器內汝釉四方雙喜尊、此十一樣款式不好，不必燒造。窯上若另有舊樣，仍隨新樣燒造。盤、碗、鍾、碟俱用篆字，款要周正。再東青釉拱花

大漢尊、嘉窯青穿枝蓮八寶雙環大尊、嘉窯青龍穿枝蓮天球尊，此三樣尊照洋彩黃地洋花宮碗上花樣燒造些。」；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又見「太監高玉持來黃磁宮碗一件。傳旨：著唐英照此樣式大小，照先進過洋彩宮碗花樣燒造些。」十二月二十八日「將唐英燒造得送到洋彩宮碗呈進，訖。」二個月時間之內，屢見乾隆皇帝命製洋彩的記錄，以及對唐英監製十一樣款式的不滿，並且命令以後不必燒造，窯上舊樣不准再用，須隨新樣，盤、碗、鍾、碟款識俱用篆字等具體指示。

如果說「磁胎珐瑯彩」是雍正朝官窯瓷器的象徵，「磁胎洋彩」則可以說是乾隆朝陶務的最高成就。雍正皇帝對待製作珐瑯彩瓷工匠頗為寬厚，對於滿意者，屢屢加賞，即使不滿，亦僅口頭告戒而已。相對的，乾隆皇帝則採較嚴厲的方式，如乾隆七年、八年唐英進呈新樣夾層玲瓏、交泰等瓷器（圖六、七、八）呈



圖七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八卦如意旋轉瓶
(列四一四 / 故瓷16923)
製作時間或為八年成作的「玲瓏交泰
瓶等十件」中之冬青描金乾坤交泰瓶。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六 乾隆八年 廠官釉洋彩連環葫蘆瓶
(列四一五 / 故瓷17209)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玲瓏如意旋轉瓶
(列四一五 / 故瓷17611)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錦上添花

乾隆四年以後，洋彩製作日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益增多。一般而言，磁胎畫琺瑯多在宮中造辦處（琺瑯作），分



圖九 乾隆五-六年 磁胎畫琺瑯粉紅地錦上添花碗（出五八二之32 / 14174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此器與院藏乾隆六年二月「磁胎畫琺瑯綠地錦上添花碗」（出五八二之31，配匣入乾清宮琺瑯器皿）。成作時間或為乾隆五年。）風格相近，應為同一時期製品。密佈的織錦紋為凹地。



圖十 乾隆五-六年 磁胎畫琺瑯紅地錦上添花茶碗（列三四九 / 故瓷17938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乾隆六年正月「磁胎琺瑯紅地錦上添花茶碗一對，配匣入乾清宮器琺瑯器皿內」，成作時間或為乾隆五年。剔刻的凹地錦紋上，再添繪洋花花卉，故曰「錦上添花」。

二地燒製完成。洋彩則是從坯胎至施釉燒成，多於景德鎮御窯廠一處燒造完成。這些記錄可由唐英〈權務督陶奏摺〉及《活計檔》內資料得見。唐英當時的職務是內務府員外郎，管理九江關務，並兼督造景德鎮御窯廠瓷器。每年春秋兩季（三、四月及九、十月中的數十日），他都會至景德鎮監督燒造御用器。

當磁胎畫琺瑯的發展到了瓶頸，無法突破原有雍正朝的成就，唐英乃費盡心思，屢屢開創新樣，採用「錦上添花」技法。在同時期的磁胎畫琺瑯器上，已見此一新技法的運用（圖九、十、十一）；於磁胎洋彩器上更見大量使用，甚至於玲瓏鏤空或轉心器上的隙地或邊飾皆見此一裝飾技法。新開發的錦上添花技法，或可被視為唐英對乾隆朝官窯的貢獻，在乾隆官窯器上佔主要裝飾地位。錦上添花技法似始於乾隆朝，一般而言，乾隆朝的織錦地，技法複雜、繁縟，有錐刻錦紋及描畫錦紋二種，一為凹地



圖十一 乾隆五年
磁胎畫琺瑯錦上添花黃地四寸碟 口徑14.1公分
(列五五四/故瓷16997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《活計檔》名稱：「磁胎畫琺瑯黃地暗花藍山水四寸碟」



(圖一、二、七、十二)，一為凸地(圖十二、十三)，在這繁密錦紋地上，再添繪紋飾，故名。許多人、花卉或開光山水的隙地圖案上皆以此為飾。(圖七、八的頸飾、內瓶、十二、十四、十五)。由故宮所藏洋彩器作一統計，在織錦式的底地上，添飾花紋的所謂「錦上添花」(圖一、二、十四)，為乾隆四年以後，洋彩中最常見技法之一，亦佔最大比例。

這種錦上添花技法，民國早

期《說瓷》、《飲流齊說瓷》等瓷書上則稱之為「錦灰堆」、「錦地花」或「規矩化」。案乾隆曾「大興錦地花，參入泰西界畫法，俗謂之規矩花，鏤金錯彩，嘆為觀止焉。」又「據《說瓷》云雍乾之間，洋瓷逐漸流入，且有泰西人士如郎世寧輩供奉內廷，故雍乾兩代有以本國瓷器摹仿洋瓷花彩者，是曰洋彩。畫筆均以西洋界算法行之，尤以開光中繪泰西婦孺者為至精之品。」逮乎現代，陶瓷研究者又稱「錦上添花」技法為「軌道」工藝。

現今故宮所藏原存乾清宮端凝殿(「列」字原始典藏編號)、養心殿(「呂」字原始典藏編號)的二百餘件磁胎洋彩器，接近八成以上紋飾，均以錦上添花技法鋪地。此一裝飾技法，或許是唐英《陶務敘略碑記》所謂「新仿西洋琺瑯畫法」之一。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日，唐英曾進呈各樣洋彩錦上添花六十二件，併其他各類瓷器五千八百餘件，乾隆僅命：「錦上添花罇、瓶、並茶圓



圖十二 乾隆七年 磁胎畫琺瑯三陽開泰長方盒 壹件
 (列六一三 / 故瓷17959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 《活計檔》名稱：「磁胎畫琺瑯錦上添花長方三陽盒」



圖十三 乾隆五年
 磁胎畫琺瑯綠竹紅梅綠地六寸盤 口徑17.2公分
 (列五五四 / 故瓷17004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 《活計檔》名稱為「磁胎綠地錦上添花法瑯六寸盤」



圖十四 由左至右 乾隆七年 口徑依次為11.6公分、13.5公分、15公分
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茶碗、磁胎洋彩紅地團花山水湯碗、磁胎洋彩藍地團花山水膳碗



圖十六 乾隆七年 磁胎洋彩番花觀音瓶
(列三八九 / 故瓷17181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《活計檔》名稱：洋彩米色觀音瓶



圖十五 乾隆七年 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玉環膽瓶
(列三七三13 / 故瓷17649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《活計檔》名稱：洋彩連環如意洋花膽瓶



圖十八 乾隆 磁胎洋彩錦書式金鐘籠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七 乾隆七年 磁胎洋彩金番花青地紙槌瓶 高12.3公分
(列四九/故瓷8492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《活計檔》名稱：洋彩金花霽青小紙槌瓶

俱留下，其餘交劉滄洲。如此龐大數量的瓷器，僅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罇、瓶三十件（圖十五十七十九），以及茶圓三十二件（圖二）獲選留下，其餘均被送往圓明園收貯。由此可見，錦上添花洋彩當時頗受重視。同月十九日〈乾清宮〉項下亦見同樣記載「洋彩翠地錦上添花玉環膽瓶一對」（圖十五）、洋彩錦上添花觀音瓶一對、洋彩米色觀音瓶一對（圖十六）、洋彩五穀豐燈瓶一對、洋彩六寸併蓮紙槌瓶一對、洋彩



圖十九 乾隆七年 磁胎洋彩藍地錦上添花冬青夾宣花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一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玲瓏渣斗
(呂四一八/故瓷17120-1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《活計檔》名稱：洋彩玲瓏查(渣之誤)斗



圖二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金番花藍地膽瓶一對
 (列三六/故瓷17207-8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 《活計檔》名稱：洋彩青(或漏「霽」字)描金膽瓶一對

紅地錦上添花三元瓶一對、洋彩黃地錦上添花紙槌瓶一對、洋彩金花霽青紙槌瓶(圖十七)洋彩錦上添花紅地洋花茶圓三十二件、洋彩五寸紙槌瓶一對、傳旨配匣入乾清宮琺瑯器皿內。(圖三左)

唐英在總理景德鎮官窯陶務期間，不斷地推陳出新，創造別具新意的洋彩器，無論造型、釉飾、紋樣皆呈多面向發展。他又極力仿製各種材質，將一種材質或裝飾，移植至另一種材質的「喬裝藝術」等，皆成為乾隆洋彩器上常見的裝飾。較常見者，包括仿古青銅器、漆器、織品、花、木材、玉石、玻璃或銅胎琺瑯。其他亦有摹仿線裝書函(圖十八)印章、竹木雕、或各式像生瓷如瓜果者，以及與其他陶瓷工藝加以結合者，如在冬青(圖七、十九)粉青、霽青(圖十七、二)哥釉、龍泉釉、廠官釉(圖六)或與青花併合加繪琺瑯(圖二)。洋彩的成形工藝包羅甚廣，有印雕、錐拱貼、鑲嵌、鏤空、套合、旋轉等方式，充分反映出乾隆朝洋彩製瓷工藝的多样化精湛技法。乾隆洋彩之成為有清一代華麗奇巧瓷器的象徵，絕非偶然。

鬼斧神工

自乾隆七年始，磁胎洋彩製

品益趨精細，講究鏤空、穿透、旋轉、層層相套、紋飾各異，製作程序困難，既複雜、又奇巧，被譽之為鬼斧神工。(圖六、八、九、三二、三五)這些層層套燒的胎地雕刻套合工序，都必須在景德鎮完成。唐英亦須由九江趕至景德鎮監製，直至燒造完成，解運進京，始回任所。《活計檔》或奏摺中皆可看到唐英從景德鎮進呈各類洋彩玲瓏(鏤空)交泰、轉心瓶的記載，其裝飾由古樸至華麗、由簡單至繁縟，一應俱全。



圖二四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旋轉大碗
 (列五八四/故瓷/8486-7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 《陳設檔案》《點查報告》：磁胎洋彩旋轉大碗，壹對(帶匣破東六十三號，乾隆年製，托可旋轉)
 《活計檔》名稱：磁胎洋彩冬青拱花五彩足大碗

夾層玲瓏（圖七、八、十九、二

一、二二）交泰（圖七、二二）轉旋（圖六、八、一九、二二、二五）等磁胎洋彩，說明了乾隆皇帝對奇巧藝術的追求，也是唐英為迎合乾隆所開創出來的新樣。乾隆八年四月，唐英新擬造得九種新樣式。四月二十一日，他在〈恭進奉發及新擬瓷器摺〉上載：「今自三月初二日開工之後，奴才在廠攢造得奉發各色錦地四團山水膳碗、盃盤併六方青龍花瓶等件外，奴才又新擬得夾層玲瓏、交泰等瓶共九種，謹恭摺送京呈進。其新擬各種係奴才愚昧之見，自行創造，恐未合適，且工料不無過費，故未敢多造。伏祈皇上教導改正，以便欽遵，再行成對燒造。另容料理新樣呈進。」由此奏折得知，這些巧奪天工的鏤空旋轉瓶，都是唐英的創作，費時、費工、費料，造價昂貴自不待言。尤為可貴的，是唐英盡心竭力不斷開發新樣，以博乾隆皇帝歡心。唐英奏摺中雖未具體指出九種新瓷名稱，但由乾隆八年



圖二三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青地金花魚遊春水瓶（列三九三 / 故瓷17646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《活計檔》名稱：磁胎洋彩魚遊春水瓶一對



圖二二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黃錦地乾坤交泰轉旋瓶（列四八之1 / 故瓷17124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《活計檔》名稱：洋彩黃錦地乾坤交泰轉旋瓶
《琺瑯陳設檔》《點查報告》俱名「磁胎畫琺瑯如意交泰瓶」應誤，故採《活計檔》正確名稱。

五月至十二月《活計檔》內〈記事錄〉或〈乾清宮〉配匣或〈入琺瑯器皿〉內的洋彩器中，仍可核對出唐英的新作。這九種新樣洋彩，亦多可從本院藏品比對而出，如「廠官釉洋彩連環葫蘆瓶」

(圖六)、「冬青玲瓏錦上添花如意瓶」(圖七)、「洋彩玲瓏查(渣)之誤」斗」(圖二)以及「洋彩魚遊春水瓶」(圖三)、「冬青拱花五彩足大碗」(《陳設檔》《點查報告》)檔名俱為「磁胎洋彩轉旋大碗」



圖二五 乾隆八年十月 磁胎洋彩萬年甲子筆筒一對 (呂一八一/故瓷13531-2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乾隆八年(1743)十二月初一日唐英奏摺稱：「于十月內在窯廠辦理瓷務，因是時工匠皆齊集，復敬謹造得萬年甲子筆筒一對。循環如意，輻輳連綿。工匠人等以開春正當甲子萬年之始，悉皆歡騰踴躍。」這對筆筒是唐英特為乾隆甲子年始(1744)所作的賀禮；然乾隆並未讚賞，僅朱批「覽」字。



圖二六 乾隆七年 洋彩紅地錦上添花江山一統爵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

圖二八 乾隆 洋彩紅地錦上添花洋花瓶一對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
成對洋彩畫樣，兩兩相同。



圖二七 乾隆七年 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冬青夾宣花瓶
(呂四四二/故瓷17872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《活計檔》名稱：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
冬青夾宣花瓶

(圖二四)、「磁胎洋彩萬年甲子筆筒」(圖二五)、「洋彩紅地錦上添花江山一統爵盤」(圖二六)等等，皆為乾隆八年四月或十月間成作的新樣。雖然唐英奏摺中提到「新擬得夾層玲瓏、交泰等瓶九種」，但並不表示夾層玲瓏技法為八年以後新創。在此之前，乾隆七年已有「磁胎洋彩玲瓏玉壺春式套瓶」的製作。此瓶樣在《活計檔》中名為「洋彩收小翠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宣花瓶」(圖一九)、「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冬青夾宣花瓶」(圖二七)，另還有「洋彩錦袱梅花龍泉玲瓏夾宣花瓶」。

《飲流齋說瓷》曾讚美「乾隆夾彩最勝鏤金錯采，幾於鬼斧神工」，二朝鼎盛，殆嘆觀止矣；又說「轉心瓶」瓶之腹際玲瓏剔透，兩面洞見而瓶內更有一瓶兼能轉動，似美術彫刻之象牙球者，然若是者名曰轉心，乃內府珍賞殊品也。《陶雅》名為套環轉動之瓶，頗嫌名稱煩贅，古物保存所則標其名曰轉心，今從之。這些珍貴的琺瑯彩及洋彩器，清

末以前皆深鎖禁苑，不為外人所識，直至民國十四年(一九一五)故宮博物院成立後，民國十九年(一九三〇)第一次於承乾宮公開展示，時人才有機會得見。《飲流齋說瓷》所說古物保存所的標名，(註五)其實多引自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(民國十四年清室善後委員會編)上的品名。而《點查報告》所列，係乾隆時期收藏器物的楠木匣上刻名，故可被視為標準品名。

一般來說，乾隆洋彩所重視的是胎地的奇巧技法，以及西洋圖案式的花草蔓藤開光或錦地添花式的圖樣。正如西洋瓷器，大多滿地繁花裝飾，極少留白；此與雍正及乾隆大半磁胎畫琺瑯重視傳統院畫繪畫技法不同。端凝殿「列」字編號磁胎洋彩即呈此一現象，而此一特徵，至今仍少見於雍正朝器物。

洋彩與琺瑯彩的異同

筆者在上一期二七九期《故宮文物月刊》曾發表〈是二

——雍乾二朝成對的磁胎琺瑯彩——
 一文，提及磁胎畫琺瑯成對紋飾為不統一的畫樣，但同屬琺瑯釉的洋彩，其成對者紋飾則大多相同（圖二八、二九）。此一區分是乾隆刻意製作或因其他緣故，暫無定論；但據實物資料統計，此一現象確實存在。乾隆七年，高宗曾命景德鎮「奉旨著照紅地四團錦上添花膳碗」（圖十四）將黃地錦



圖二九 乾隆七年 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喜相逢腰圓瓶一對 瑞士包爾美術館藏與故宮所藏一對幾乎完全相同，據《活計檔》記載當年製作二對磁胎洋彩成對紋飾，兩兩相同，統一畫樣。

上添花膳碗燒造些，其紅地錦上添花膳碗仍燒造，再紅地錦上添花圓盃盤、葵式盃盤、海棠式盃盤亦仍燒造，此三樣盃盤將黃地天青地錦上添花盃盤各燒造些（圖三），青花白地盃盤亦燒造，盃盤俱要成對。」另外，「洋彩魚遊春水瓶一對（圖三三）、洋彩玲瓏查（渣之誤）斗一對（圖二一），傳旨配匣入在法瑯器皿。」類此檔案，皆見以成對洋彩燒造錦上添花器或配匣的記錄。

《活計檔》或《琺瑯陳設檔》內的成對乾隆洋彩器，經筆者查核，大多數可與現藏故宮的洋彩器比對得出。這些成雙成對的洋彩器皿，除四團錦上添花上開光山水不一定完全相同外，其餘多為相同的一對。筆者根據統計比例，認為洋彩畫樣大多兩兩相同，即為統一畫樣的一對（圖二二、二五、二七、三三），而磁胎畫琺瑯則為相似而不相同（圖十、十一、十三）。此一現象，於故宮院藏洋彩器上，均可檢出。以習慣而言，成對者應該就是一模一樣的



圖三 乾隆七年 紅地錦上添花海棠式盃盤、黃地錦上添花海棠式盃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一 乾隆六年
磁胎畫琺瑯錦上添花藍地三寸碟 口徑10.7公分
(列五九七/故瓷17112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《陳設檔案》《點查報告》俱為磁胎洋彩(或誤)

形制及紋樣；然而，清宮磁胎畫琺瑯及磁胎洋彩製器，往往表現出二種不同規範的裝飾技法。不過，這一種乾隆所重視的時作器，亦偶有少數例外者。

《琺瑯陳設檔》上所載，磁胎「洋彩」偶與磁胎畫琺瑯相互混淆使用。而同一器物，於兩種檔案內亦呈現不同的名稱。例如《琺瑯陳設檔》、《點查報告》皆載「磁胎畫琺瑯如意交泰瓶一對」(圖三二)，但乾隆八、九年《活計檔》卻記為「洋彩黃錦地乾坤交泰旋轉瓶一對」。同為清宮檔案所載，一為磁胎畫琺瑯，一為磁胎洋彩；然比對技法，則應屬洋彩。

另外，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綠地三寸碟(圖三一)在《琺瑯陳設檔》及《點查報告》皆俱名為「磁胎洋彩」。然而乾隆五、六年《活計檔》內各有數項畫琺瑯與洋彩三寸碟品項，因所記品名不完全，不能確定其屬。六年十二月「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小碟四件。內有藍地二件。」，另亦有

「磁胎藍地畫琺瑯三寸碟」。不過，以裝飾技法而言，此對小碟的外壁為淺藍地錦上添花紋飾，碟內則為白地畫琺瑯，其技法應與圖一一乾隆五年「磁胎畫琺瑯錦上添花黃地四寸碟」及「磁胎畫琺瑯四季花綠地四寸碟」相同。凡此或為《琺瑯陳設檔》的誤登。是以這類外壁以錦上添花裝飾，內壁白地繪花卉或山水者，確屬磁胎畫琺瑯。

相對的，亦有將畫琺瑯列為洋彩者，如《琺瑯陳設檔》、《點查報告》所謂「磁胎洋彩花鳥四寸碟」(圖三二，註六)不過，就其製作特徵而言，此項盤器應屬「磁胎畫琺瑯」。造成這些兩類器物糾葛不清的原因，大多屬《琺瑯陳設檔》登記時無核對實物，或配匣刻名的疏忽，並不是製作分類(《活計檔》)的錯誤。

此外，還有一種情形則如前述，即清宮檔案皆載為「畫琺瑯」民國二十五年故宮文物赴倫敦展覽時，經主事者更改為「粉彩」者。如原始典編號為「列



圖三三 乾隆五年 磁胎畫琺瑯合歡蓋罐
 (列五六九 / 故瓷17873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 長久以來此罐被定為「粉彩」，然清宮檔案皆載為「磁胎畫琺瑯」，故相同裝飾技法的康雍乾三朝類似器，是否應予正名，頗值得研究者思考。



圖三二 乾隆八年
 磁胎畫琺瑯花鳥四寸碟一對 口徑13.5公分
 (列五九八 / 故瓷17875-6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 《陳設檔案》《點查報告》俱為磁胎洋彩花鳥四寸碟(實誤)

五六九」的「磁胎畫琺瑯合歡蓋罐」《琺瑯陳設檔》、《點查報告》名稱俱同(圖三三)，卻更名為「粉彩久安圖雙連蓋罐」。此器為乾隆六年《活計檔》入乾清宮琺瑯器皿的「磁胎畫琺瑯合歡瓶」。以裝飾及繪畫表現而言，皆與前述洋彩風格極為不同。因此《活計檔》內記載不僅否定了以往對於「粉彩」的定義，亦使得對這類器物的習慣稱法，是否應有所改變，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。這兩類器物分辨不清的最大原因，乃在於檔案名稱與實

物無法互證。原始名稱一經變更，亦難與史料比對互證。此合歡(雙連)蓋罐長久以來被視為「粉彩」，粉彩即洋彩之說，又被大多數研究者所接受。所以「磁胎畫琺瑯」與「磁胎洋彩」兩類器物經人為糾葛不清的情況雖非始於今日，但在乾隆朝只是少數誤登而已，大部分則多為後人誤解逕行改稱，以致造成訛傳。雖然如此，琺瑯彩與洋彩仍舊涇渭分明，由實物與文獻史料結合，比對分析之下，終究還是可以理出脈絡的。



圖三四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玉環蒜頭瓶
(列三九九之2 / 故瓷1744-5)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《活計檔》名稱：「洋彩白地金寶蓮
蒜頭瓶」

經此整理，院藏「磁胎洋彩玉環蒜頭瓶」(圖三四)亦即《活計檔》所稱之「洋彩白地金寶蓮蒜頭瓶」，亦可視為此類洋彩器



圖三五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白地金寶蓮蒜頭瓶
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的依據。這類器物(圖三五、三六)

以其錦上添花及繪畫技法，應歸類為洋彩。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總數約六百件左右的琺瑯彩系瓷器，大多為完成於乾隆四年至八年間的清盛世之作。乾隆皇帝即位之初，意氣風發，充滿自信，在文治武功或藝術各方面，皆欲有所作為。此一時期的磁胎畫琺瑯、磁胎洋彩風格亦成為乾隆朝工藝美術最大特色之一。

小結

綜上所述，磁胎洋彩經清末民初陶瓷學者根據認知所訂，已



圖三六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玉環雙象耳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被通稱為「粉彩」。現今陶瓷研究亦從美術、釉彩、工藝的觀點，加以分析，並結合民窯粉彩製作特點，將洋彩、琺瑯彩作較科學的分類與定名，「洋彩」即「粉彩」



圖三八 雍正 磁胎畫琺瑯菊花盤
闕四三033之1 / 故瓷1501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此盤以技法而言，應為畫琺瑯，而不是洋彩，如洋彩等於粉彩，當然亦不屬粉彩。



圖三七 康熙 磁胎畫琺瑯花蝶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筆者以為，此盤之繪畫技法為畫琺瑯，並非洋彩。

註釋

一·楊獻谷〈古月軒瓷考〉(民國二十二年) 邵鵬民原著、余戟門《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》(民國二十七年)。另郭葆昌〈瓷器概說〉或董書業〈清初官窯瓷器史上幾個問題的研究〉(民國四十六年)等著作內均有提出古月軒不為琺瑯彩的說法。

二·朱家潛，〈清代畫琺瑯器製作考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，一九八一年第三期，頁六七。

三·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記載端凝殿所藏近六百件康雍乾瓷胎畫琺瑯與洋彩琺瑯彩器名稱，基本上與《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》所載相同。然而，民國二十四年(一九三五)，故宮文物至倫敦展覽時，大部分品名經主事者更動，磁胎洋彩器也同時被更換為「粉彩」。不

之說，似亦可行，亦不可行。如果將清宮內廷燒成的磁胎畫琺瑯器，與景德鎮御窯廠燒製的洋彩混為一談，結果不僅「琺瑯彩」、「洋彩」難以界定，「洋彩」、「粉彩」器物的分辨，亦無法解決。故筆者認為「琺瑯彩」與「洋彩」或「粉彩」，實不宜混淆。

現今多數研究者將洋彩與粉彩畫上等號，認為粉彩技法始自康熙晚期，(圖三七)並將若干裝飾納入粉彩規範。(圖三八)然而，

僅瓷器品類，甚至形制、紋飾亦經更動，而今原品名亦多沿襲此時期所訂者。(參見《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瓷器目錄》)

四·回復至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上的原來名稱，亦為《琺瑯陳設檔案》上之品名。

五·據此，《飲流齋說瓷》成書時間或為民國十四年點查之後，或十九年故宮文物公開陳列之後。

六·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中的訂名，是依據清宮配匣上的名稱所定，基本上也就是原始品名。「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綠地三寸碟」及「磁胎洋彩花鳥四寸碟」原應為磁胎畫琺瑯，但均被誤載為「磁胎洋彩」。前引文，朱家潛〈清代畫琺瑯製造考〉文中附錄部分未載洋彩，故此二對當未列於朱先生所抄錄的磁胎畫琺瑯(附錄)內。

唐英自幼供役康雍乾三朝內務府，並於雍正六年至景德鎮監督窯務，自不可能對康熙朝以來既存在的洋彩技法有所忽視，並在《陶務敘略碑記》或《陶冶圖說》內提出「洋彩器皿，本朝新仿西洋法瑯畫法」之說。再者，現今這些被載為粉彩器皿者，風格上也顯然與乾隆朝宮廷記載的「洋彩」作品有所差異。因此「洋彩」即「粉彩」之說，仍有商榷辨證的空間。